

## · 方志图谱学研究 ·

## 《河套图》与《广舆图》的渊源关系

杨 正 泰

徽商黄汴编绘的《河套图》<sup>①</sup>是一幅大有来历、很值得研究的地图。该图内框长25.8厘米，宽18.5厘米。以黄河、长江二流域为主区，东起开元、辽阳，西至黄河源星宿海，北逾河套，南及岭南。绘有名山大川、二京十三布政司及重要地名三十余处。图内，黄河、长江及主要支流用双线表示；湖泊用封闭曲线，内加水纹表示；主要山脉用正面投影形象图例表示；海域用波纹表示；二京用方框表示；其他地名用文字表示。图幅左上方注云：“是图出东坡地理指掌，吉安罗君得元人朱思本画方之法，梓成巨本不多，有人所罕见者。今据其图并录其说，使人得而见之。”

注文所云“吉安罗君”，指明代著名地图学家罗洪先。罗洪先（1504—1564）字达夫，号金庵，江西吉安府吉水县人。他以元人朱思本的《舆地图》为基础，又搜集资料，增加内容，将《舆地图》改绘成著名的《广舆图》。《广舆图》的主要贡献是：一、将朱思本“长广七尺”的大图，按照分幅的办法，改制成地图集；二、除改绘朱思本《舆地图》外，又增加数十幅朱思本原图没有的图幅；三、最早在地图上使用图例符号。经过罗洪先的努力和改造，朱思本的绘图技术被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使《广舆图》成为明代地图学上继往开来的代表作，影响我国地图学数百年之久。黄

汴云“吉安罗君得元人朱思本画方之法，梓成巨本不多，有人所罕见者”。所指即此。

《河套图》是根据罗洪先的编绘原则，利用《广舆图》的先进成果而绘成的一幅简图。它的图面内容、文字注记和绘制手法，与《广舆图》卷一《舆地总图》、《山东舆图》、卷二《黄河套》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罗洪先编绘《舆地总图》（上海图书馆藏《广舆图》，明万历七年刻本）的原则是：“每方百里，只载府，不书州县。山止五岳，余别以水，不复概书。”<sup>②</sup>该图内框长 27.5 厘米，宽 39 厘米，图幅不大。在应用现代印制技术前，能够容纳的行政区划和地理要素不多，一切必须择要入图，否则图幅难以安排，所以在行政区划方面，“只载府，不书州县”。绘出的名山只有泰山、华山、嵩山、恒山、衡山，水系只有黄河和大江，大湖只有太湖、鄱阳、洞庭、马湖以及西北的兀达脑儿，另有四处湖泊而未注名称，其余内容一概省略。黄汴编绘《河套图》时，由于图幅不及《舆地总图》一半，遴选入图的内容更为有限，所以《河套图》只标二京十三布政司，而不书府州；入图的名山，除增加与江源有关的岷山外，只收五岳；水系也只绘黄河和大江；绘出的大湖，省去西北边陲的湖泊，其余和《舆地总图》一样。此外，海岸线轮廓、水道走势十分相像；黄河、长江无论是源头和河道流向，还是支流和入海口的绘法，都与《舆地总图》一般无二。可见黄汴采纳了罗洪先精选内容和择要入图的编绘原则。

《河套图》全文引用《广舆图》卷二《黄河图》的旁注，其文云：“汉使张骞持节西域，访河源，以为二水发葱岭，趋于阰，汇盐泽，伏流千里，至积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访河源，得之闷磨出。世之论河源者，率皆本此，莫知其非也。至元，始命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往求之，四越月而得其说，如图所载。还，具以闻。其弟阔阔出授其说，翰林学士潘昂霄撰为记，而临川朱

思本于八里吉思家得帝师所藏梵字图书，译之，与潘互有小异，俱载《元史》。黄河本东北流，历西番，至兰州，凡四千五百余里始入中国，又东北流，过虜境，凡二千五百余里始转河东，又南流至蒲州，凡一千八百余里，通计屈曲九千余里。而张騫所访，乃在其西万里外，盖为吐蕃遮隔，不可假道故也。世之受蔽于外，舍近求远者，何以异此。朱思本姓名因《河源记》始传，其为图与所记山水道里不少差舛，特存之，以代辘轳之对。或言天下之山，皆源于昆仑，今观之图，岂足与辩，未能实诣而询传闻，不独于山然也。”通篇总共 318 字。黄汴《河套图》注文，虽未明言引自何处，但对照《广舆图》，除“过外境”的“外”被改为“虜”字外，其余 317 字一字不差。这一不同，究竟是黄汴所改，还是刊刻错误，不得而知，但从《一统路程图记》其他地方的行文分析，黄汴曾数次用“虜”字，故笔者以为前者可能性较大。以上种种情况表明，黄汴所云“据其图并录其说”，诚非虚妄也。

《河套图》并不是简单仿照《广舆图》的复制品，而是充分吸收和利用《广舆图》多幅地图研究成果，重新创作的作品，其文献价值和绘制水平超过其他商用地图。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三点：

1. 参考《广舆图》最新版本对黄河源的画法，较早在地图上普及元代考察河源的成就和明代绘图学的成就。

黄河源头地处高寒地区，人迹罕至，古代文献记载不详。黄河源头究竟在何处，长期以来，未有定论。元至元十七年（1280），都实考察黄河源是我国历史上封建国家第一次有组织地对黄河源进行的专门考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后来，元翰林学士潘昂霄根据都实之弟阔阔出的记述，写成考察河源的专著《河源志》，此外，临川朱思本从八里吉思家得到帝师所藏的梵字图书，其中也有一份考察河源的记录，与“昂霄所志，互有详略”<sup>③</sup>。这两个材料都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记述考察黄河源的专门著作，原著久已不存，惟《元史·地理志》在《河源附录》一文中有所转

录，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保存有《河源图》<sup>④</sup>。《河源志》根据野外考察获得的资料，记述了黄河上游的主要支流和水文特征，以事实否定了汉代以来盛行的“重源伏流”说，在指出星宿海是河源的同时，还注意到“东北流百余里”的火墩脑儿，这一发现不仅比唐代大有进步，与现代调查结果也吻合，充分反映了元代考察河源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元代考察河源的报告，当时没有公布，鲜有人知。《元史》修于明初，洪武刻本是祖本，藏于内府，束之高阁。嘉靖初，编刊二十一史，方在社会上流传。朱思本所绘《舆地图》原本面积太大，不便翻刻，故流传不多。摹绘本及刻石久已不存，根据朱思本改绘的《广舆图》，第一次刊印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第二次刊印在嘉靖三十七年（1558），第三次刊印在嘉靖四十年（1561），其间还有手抄本和其他刻本。值得注意的是，《广舆图》是在嘉靖四十年（1561）刻本中始将黄河源改成葫芦形的，《河套图》的黄河源也呈葫芦形，其刊印时间是隆庆四年（1570），两者相差不过10年时间。这在信息传播渠道不畅，传播时间有限的古代，如此迅速地转载元代考察河源的发现，并出版有关地图，对大多数民众来说，不能不算是很新的信息和研究成果。商书编绘和出版这类地图，比《广舆图》本身影响的面更大，因此，它在传播元代考察河流方面的贡献，比《广舆图》大得多，《河套图》在这方面的贡献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2. 在地图上及时标绘漕运备道——胶莱新河，表明作者对国计民生的关注。

元代以大都为京城，远离经济发达的南方，大部分漕粮和军饷皆需南方供给。为解决漕运问题，元政府浚通了北起大都，南至杭州的大运河。由于黄河含沙量太大，受其干扰，运河也经常淤浅，再加上工程技术方面的原因，这条大运河很快便失去运漕的功能，漕粮仍由海道运往京师。明代建都北京，南粮北运的格局未有改观，永乐间浚疏大运河成，改海运为河运，但黄河仍经

常影响运河，使漕运发生困难，故有明一代虽以河运为主，但海运始终不弃。海运路途远，风浪大，粮船经常沉没，粮食不能准时按量运到大都，运粮军民也视海运为畏途，经常逃亡。海运绕道最远和风浪最大的地区，便是粮船经过的山东半岛。为减少粮船沉溺事故，寻找运河备道，元明政府数次议开胶莱河。元代胶莱河地区，旧有二水，源出高密县，分南北流，南流者从胶州麻湾口入海，名胶河；北流者从掖县海仓口入海，名莱河。二河中间，相距三百余里，本不通航。元至元十七年（1280），莱人姚演献计开新河，凿地三百余里，沟通莱河和胶河，谓之胶莱新河。胶莱新河开通后，江南海运自太仓出口，抵达胶州，经胶莱新河，出海仓口，浮海抵直沽，“可避东北海险数千里，较漕河为近”<sup>⑤</sup>。但胶莱新河地质情况复杂，施工难度较大，耗费银两惊人，开与不开，争论非常激烈。明嘉靖中，曾因元人故道，“凿马壕以趋麻湾，新河出海仓”，“由是江淮之舟达于胶莱”<sup>⑥</sup>。当时，朝野上下十分关注胶莱新河，这个问题可说是社会议论的热点。《河套图》未画京杭大运河，但却画上胶莱新河，表现出黄汴对胶莱新河的重视，以及他对社会热点问题敏锐的洞察力。《广舆图》卷一《舆地总图》绘有胶河和莱河，但无注记。《山东舆图》绘有胶水，文字注记曾提及胶莱河，但地图上未标明名称。《河套图》不仅明确绘出胶莱河，还标注了名称，这是黄汴《河套图》超过《广舆图》的地方之一。

3. 《河套图》标注的海陆岸线、河道走向和地名方位，更接近现代测绘地图，较同时期商书地图准确。《河套图》虽然未用计里画方方法绘图，但其所绘的海陆岸线、河道走向和地名方位的准确性，都比同时期商书地图高出一筹。例如天启六年（1627）出版的《士商类要》卷首《舆地总图》（以下简称《士商类要图》），在上述诸方面，皆不如《河套图》。在海陆岸线方面，《士商类要图》未标出向东突出的山东半岛；而《河套图》绘出了明显的半

岛地形。在黄河流向方面，特别是源头和上游的走势，《士商类要图》与今实测地图相比，准确性相差甚远，而《河套图》则与现代实测地图相近。在标注地名方面，《士商类要图》的取点定位存在不少明显错误，如将嘉峪关标注在河套内，贺兰山标注在河套东，而《河套图》标注的嘉峪关在河套以北，贺兰山在河套以西，与今实测地图一致，其他地名如甘州、肃州、贵德等地的方位也较为准确。《士商类要图》水道表示方法不一致，黄河在双线内加波形水纹，大江及其他水道在双线内则未加波形水纹，而《河套图》则绘法统一，不存在这类问题。《一统路程图记》成书早于《士商类要》，但其编绘或参照的地图却比《士商类要图》科学。作为一名商人，在搜集和编纂商书时，能够及时掌握和正确运用地图学的最新成果和制作方法，编绘出如此高质量的示意图，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笔者看到的商书地图虽然不多，但其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很有学术水平和文物价值的，黄汴编绘的《河套图》就是如此。

注：

- ①黄汴：《一统路程图记》卷首。
- ②罗洪先：《广舆图》卷一。
- ③《元史·地理志》河源附录。
- 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二。
- ⑤⑥《明史·河渠五》。

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